

周用《楚詞註略》探析

陳煒舜*

【提要】

道學獨尊的明代前期，屈原受到道學家和臺閣文人的批判，導致了楚辭學的沉寂。當時只有朱子《楚辭集註》流行於世。由於朱註被認為從儒家的角度規範了《楚辭》，因此擁有不可動搖的權威地位。明代中葉以後，學術風氣產生了巨大的轉變，新的楚辭著述相應出現。周用《楚詞註略》是得風氣之先的一種。周用長期身居高位，作品繼承了臺閣文風，但他對於《楚辭》的興趣卻顯示出道學對臺閣文人影響的式微。此書篇幅雖然簡短，卻率先提出了不少異於朱註的意見。周用對屈原抱持著遠較其前輩正面的態度，將論析的篇章鎖定於屈原作品，從詞章、而非僅從義理的角度來研究《楚辭》。此外，周用對各篇創作年代、〈九歌〉篇數等專題的考據推論，也與稍後眾多的楚辭註家是一脈相承的。本文嘗試分析此書，論評其得失，以見明代楚辭學方興未艾之際的相關著述之特色。

關鍵詞：周用 《楚詞註略》 楚辭學 明代文學

*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引言

明代洪武到弘治一百四十餘年，國勢較穩定、朝政較清明。同時，在這皇權膨脹、道學獨尊的時代，楚辭學也是沉寂的。高攀龍云：「世人僅知屈子以詞，而儒者又謂其過怨，失中和之則。」^①由於屈子思想與儒家有同有異，《楚辭》受到了道學家和臺閣官員的抨擊。如洪、建間的方孝孺〈艾庵記〉寫道：

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獸，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芷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謂三閭褒貶為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狷者也。其取物也，恆遍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繇聖賢之道觀，艾何負於蘭芷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②

指出艾草本是「藥石之品」，〈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之言褒貶失當，進而批評屈子作品之取物「恆遍於名而不切於用」。以致篇末，友人竟稱許方氏之言「可正三閭之陋」。方氏此處站在儒家的實用主義角度立論，所謂「不切於用」不僅是針對《楚辭》的創作手法，更引申出對文學家華而不實的不滿情緒。再如弘、正間的臺閣大老、文壇領袖李東陽云：

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③

以為孔子刪詩而不錄楚風，就是因為楚國地處蠻夷，荒遠鄙陋。故此，明

* 《楚詞註略》一書，蒙友人 Ms. Steffi Pon 自滬上影印郵寄；撰稿初期，又承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余汝豐老師指點。謹致謝忱。兩位匿名評審者給予珍貴的意見，在此深表謝意。

① [明]高攀龍：〈三時記〉，《高子遺書》（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92-613。

② [明]方孝孺：〈艾庵記〉，《遜志齋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35-442至1235-443。

③ [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李東陽全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初版），頁537至538。

代前期幾乎沒有新的楚辭學專著面世，朱子《楚辭集註》大抵是唯一流行的《楚辭》本子。成化間，何喬新重刊朱註作序，認為《楚辭》作為辭賦之祖，導致後世文人捨質逐華、為文害道。只有經朱子刪註，《楚辭》方才大義昭然，讀者可以放心閱讀了。^④ 閣臣吳寬亦云：「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⑤ 在這樣的主流意見影響下，明代前期的大多數學者即使對《楚辭》略有論述，也只停留在闡發朱註的層面，未能深入。

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閣臣如周敘、丘濬，道學家如薛瑄、陳獻章等，開始不拘成說。薛瑄道：

余往年讀《楚辭》喜其華，今讀《楚辭》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⑥

斷言《楚辭》的內容是華實兼備的。周敘〈湘川雜詠八首·其五〉云：

汨羅近與湘川接，日暮停舟弔楚魂。遺恨萬年流不盡，至今光價照乾坤。^⑦

對於屈子的遭遇是表示同情的。臺閣文臣向來詩崇王孟，文尚歐曾，就是因其溫柔敦厚的風格和盛世相配。然而隨著道學的僵化、朝政的隳壞，文學上求變的聲音逐漸強烈，而首要主張就是師古。針對臺閣文風，前後七子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文學的師古說激發了學者對《楚辭》的興趣。如吳國倫云：

粵自結繩以還，竹書韋編，以及二〈南〉、十五國〈風〉、其詞醇麗溫厚，蓋

^④ [明]何喬新〈楚辭序〉：「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詠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淒然興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也，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也。」（見《椒邱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49-138至1249-139。）

^⑤ [明]吳寬：〈題九歌圖後〉，《家藏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55-462至1255-463。

^⑥ [明]薛瑄：《讀書錄》，《薛瑄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1229。

^⑦ [明]周敘：〈湘川雜詠八首·其五〉，《石溪周先生文集》（臺南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萬曆二十三年(1595)刻本，1997年初版），頁集31-581。

上世之大音也。逮夫《三傳》、八書、《離騷》、《十九首》，紀述既嫺，諷詠合度，去古未遠，詞旨廓闕。^⑧

以爲《楚辭》時代距離孔子比較近，因此「詞旨廓闕」。而李夢陽〈潛虬山人記〉則曰：

山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窮心賦騷於漢唐之上。^⑨

可見師古說者論文體，以楚騷、漢賦、唐詩爲上乘，與其前輩李東陽已經大爲不同。於是在成化、弘治年間，出現了明代第一種楚辭學新著——桑悅的《楚辭評註》。桑悅仕途偃蹇，故註《騷》以澆壘塊。由於此書一直未有刊行，加上作者的狂士形象不爲當世所接受，故在明代前期影響甚微。直到明末清初，其內容才零星見於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周拱辰《離騷草木史》等著作。根據這些殘留的片段，可知桑註雖然著意於詞章，但以《騷》註我的心態甚爲強烈，如評〈惜誦〉：「迷不知寵之門句，竟寫出一個桑判官。」^⑩ 一些論述也傾向個人的體認，如評〈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一段：「如入深徑無人覺，古木枯藤，皆有異致。」^⑪ 類近晚明坊間帶有師心色彩的評點著作，雖可輔助人們閱讀，但以研究的層次來看則不盡客觀。

正德中，王逸的《楚辭章句》得以重梓面世，當時臺閣大老、文壇耆宿王鏊爲之欣然命序。王鏊從文學和文獻學的角度審視、比較《章句》和《集註》，追溯了二者之間的關係，肯定了前者的優點，也對後者被神化的地位提出了質疑。^⑫ 王逸《章句》的復出，標誌著明代楚辭學走出朱註獨尊的時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兩本新的楚辭著述——馮惟訥《楚辭旁註》和周用《楚詞註略》隨而在嘉靖前期面世。馮書唯在每頁眉間標以音

^⑧ [明]吳國倫：〈胡祭酒集序〉，《瓶甌洞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萬曆刻本影印，1995年初版），頁461。

^⑨ [明]李夢陽：〈潛虬山人記〉，《空同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62-446。

^⑩ [明]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天啟六年(1626)刊本）卷四，頁2b。

^⑪ [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1803)聖雨齋刻本）卷二，頁21a。

^⑫ [明]王鏊：〈重刊王逸註楚辭序〉，《震澤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56-280至1256-281。

叶，並無註文。¹³ 周書正文雖也不過筆記四十一則，但內容視馮書為豐富。與桑悅等坎壈失志而註《騷》者不同，周用乃朝廷命官，生活於道學影響猶深的正德、嘉靖之時。四庫館臣稱「其詩古體多嘽緩之音」，¹⁴ 可見仍沾染著濃郁的臺閣文風。而且，《楚辭註略》〈自序〉言屈子平生以貞信自許，學問汗漫橫肆，而後人讀《騷》，多只眩惑於文辭，且模擬其辭以騁浩蕩之懷，實非屈子之志。¹⁵ 這也明顯是臺閣中人的語氣。因此，本論文擬考察周用《楚詞註略》一書，以見明代楚辭學在方興未艾之際的特色。

二、《楚詞註略》的著者生平及著作動機

周用（1476-1547），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1502）。授行人。正德初，擢南京兵科給事中，改南京兵科。諫迎佛烏斯藏，以中旨遷黜尙書、都給中等官。出爲廣東參議，預平番禺盜，有功。歷浙江、山東副使。擢福建按察使，改河南右布政使。代監司鞫南陽滯獄，獄爲之空。嘉靖八年（1529）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召協理院事。歷吏部左、右侍郎。以起廢不當，調用南京刑部。遷右都御史，工、刑二部尙書。九廟災，自陳致仕。既罷，中外皆惜之，頻有推薦。久之，以工部尙書起督河道，數月，改漕運。未上，召拜左都御史。二品九年滿，加太子少保。

¹³ 案：馮書於北京國家圖書館有藏，扉頁云《楚辭註》，卷一前題下云「北海馮惟訥校刊」，可見馮氏並無註釋工作。《旁註》之名，實來自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影印初版）。此書的刊行年代，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考定爲正德十六年（1521）。其理據爲：書首陳憲之序題於「嘉靖辛巳」，查嘉靖無辛巳年，故辛巳當爲武宗正德十六年，同年四月，世宗即位，次年正式改元嘉靖，故此書係刻於1521年4月之後、1522年之前。（見崔富章編：《楚辭書目五種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78。）古制，嗣皇帝即位，詔改明年之年號；若非特殊情況，本年仍保留原有年號，以敬崇先帝。故正德辛巳年四月後，世宗雖已入承大統，然斷未即時改元嘉靖。故崔說有疑點。筆者推斷馮書刊行於嘉靖前期，原因有二：一、筆者至北京國家圖書館檢閱此書，見陳序題於「嘉靖辛巳冬十月望後四日」。嘉靖既無辛巳年，則序中「嘉靖」、「辛巳」兩者必有一誤。干支較年號容易錯寫，而嘉靖二字不應有誤。二、馮惟訥生卒年雖不詳，但主要活動於正德及嘉靖前期。

¹⁴ [清]永瑤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初版），頁1568。案：《史記·樂書》：「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正義〉云：「嘽，綽也。緩，和也……言人君道德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與節奏簡略，而下民所以安。」（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頁1206至1207。）故「嘽緩」有舒緩而不急迫之意。四庫館臣又云：「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嘽緩冗沓，千篇一律。」（同前書，頁1497。）「正統、成化以後，臺閣之體漸成嘽緩之音。」（同前書，頁1487。）臺閣作者為了表現盛世的熙皞之象，詩崇王孟，文尚歐曾，取其雍容自得之態也。可見「嘽緩之音」，正是臺閣流裔文風的主要特色。

¹⁵ 見[明]周用：〈自序〉，《楚詞註略》（上海圖書館藏順治九年（1652）周之彝刊本），頁1a至1b。

二十五年（1546）爲吏部尙書。明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肅。¹⁶ 著有《楚詞註略》、《周恭肅公文集》及《困知》、《讀易》諸書。

周用一生於仕途數落數起。他於正德時不畏武宗、劉瑾之氣焰，抗顏而諫迎佛；嘉靖時平番禺盜、鞫南陽滯獄。這些政績，皆足稱述，故晚明首輔葉向高讚揚周用「內攻貂豎，外觸要津」，¹⁷《明史》稱其「端亮有節概」，¹⁸武宗逸樂，世宗昏憤，於史昭然。周用雖亦深明用晦之道（如九廟災而請致仕），然其本性剛正，未必不引屈子爲知己。《楚詞註略》〈自序〉言「人生相知之難，豈直君臣者」，¹⁹殆有感而發。故周用雖不似桑悅沉淪下僚，但註《騷》的原因大抵還是爲了抒發仕途上的抑鬱。除此之外，周用也在〈自序〉中說明了自己研究《楚辭》的方法：

- 一、屈子平生以貞信自許，學問汗漫橫肆。其文采雖然斐然，但爲文還是爲了明心、宣哀、達志。後人讀《楚辭》時只眩惑於文辭，模擬其辭以騁浩蕩之懷，這實非屈子之志。
- 二、《楚辭》諸篇意義往往前後相發明，故「比類而觀」是理解《楚辭》的法門。
- 三、鑒於朱子《集註》及其他舊說仍有未盡之處，猶須探索闡釋，故「註略」有兩層意義：一爲領其要，一爲祛其疑。領要、祛疑皆基於舊註而爲之，故《註略》一書簡短，僅陳大略而已。²⁰

以上三點主要是就屈子生平與作品兩端而發。進而言之，本書以《集註》爲本，然於王逸、朱子之註有申述處、有反對處。故閔亥生序稱《楚詞註略》「其詞約，其旨遠，斷章取義，與王逸、朱紫陽相表裡。誠左徒之功臣，而立言之盛事也」。²¹點明了此書與王、朱二註斟酌損益的關係。

¹⁶ [清]張廷玉主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頁5330至5331。

¹⁷ [明]葉向高：〈冢宰周恭肅公祠記〉，[明]周用：《周恭肅公集》（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周國南川上草堂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頁55-159。

¹⁸ 同註16。

¹⁹ 同註15，頁1b。

²⁰ 同註15，頁1a至2a。

²¹ [明]閔亥生：〈楚詞註略序〉，《楚詞註略》序頁1a至1b。

三、《楚詞註略》的版本

周用《楚詞註略》一書，除上海圖書館收藏一冊外，目下別無所見。書首爲閔亥生序，以章草手書，計四頁。²²次爲周用自序，下署「周恭肅公著，裔孫之彝較刻」。²³序後即爲《註略》本文一卷，釋屈作二十五篇，只錄註解，不收原文。二十五篇之篇目全據朱子。〈東皇太一〉、〈雲中君〉、〈禮魂〉、〈橘頌〉、〈漁父〉五篇無註，但列篇題；其餘則每篇有全篇總論及章句大意，而〈九歌〉獨有釋題。不計〈東皇太一〉等五篇的標題，正文有註文四十一則。正文連〈自序〉，共十九頁。〈自序〉不言刊行年代，《楚辭書目五種》僅著錄爲「裔孫周之彝敘倫刊本」；《楚辭著作提要》定作「明萬曆刊本」。²⁴考《明史》，周氏卒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則該書之完成必不遲於此年。閔亥生謂「其（周用）後人敘倫，將梓之以行世，而屬余更爲序」，²⁵題署於「壬辰」仲夏。²⁶據咎亮考證，此書實應刊於順治九年（1652）壬辰。²⁷書中並未提及此次梓行爲重刊，因此可推斷：《楚詞註略》當是周用的讀《騷》筆記，隨篇發論，並未制定嚴格的條例，在周用生前未有付印。周之彝得先人遺墨，遂以原樣刊行，沒有進一步整理全書。

楚辭作品在漢代有兩種編集。《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二十五篇」，²⁸類近後世所謂別集。此書今已不見，二十五篇的詳目也不得而知。而劉向收錄屈子、宋玉、賈誼、東方朔、莊忌等人的作品，題爲《楚辭》，體裁類近總集。其後的楚辭註解，都是以劉向一書爲底本的，如漢王逸《楚辭章句》、晉郭璞《楚辭註》、宋林至《楚辭故訓傳》等。不然，則從《楚辭》取某篇爲註，如宋楊萬里《天問天對解》、宋呂祖謙《離騷章句》等，²⁹鮮有註本單解屈作二十五篇。直到朱子《集註》，始推定屈作二十五

²² 案：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新一版）收錄閔□生序，序中之字遇有不能識者，遂以方框代之。經辨識，各字皆已確定，且發現姜書中有辨識錯誤之字。如閔序「泉、變、稷、契不才」，「才」當作「幸」，姜氏誤識。又閔□生當爲閔亥生，其人《湖州府志》有傳，可參詳之。

²³ 同註15，頁1a。

²⁴ 潘嘯龍、毛慶主編：《楚辭著作提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初版），頁43。

²⁵ 同註21，序頁1a。

²⁶ 同註21，序頁4a。

²⁷ 見咎亮：〈《楚辭書目五種》補考五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1997年第3期，頁16至21。

²⁸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頁1747。

²⁹ 參看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

篇的篇目。周用從朱子之說，在《楚詞註略》中僅論屈子作品，餘者皆不及。其〈自序〉云：

後世詞人，擬遊仙等作，以騁浩蕩之懷，以為本於〈離騷〉，屈子之志荒矣！豈惟後人，自宋玉以下，亦或以輕舉放志為樂，則自其當時師弟子之間，已失其旨。³⁰

以為屈子貞信博學，後世無人能及，宋玉以後的辭賦家偏離屈子之志，其作品不可與屈作相提並論。故周書名雖為《楚詞註略》，而內容則僅僅涉及屈子一人而已。前文言及，〈東皇太一〉等五篇無註，但列篇題。何以如此，周氏並未說明。筆者以己意忖之，蓋周氏所註只限於屈作，其於〈東皇太一〉等五篇雖無新見，但仍保留篇題，以示屈作之目次。這種將《楚辭》編為屈子別集的方法由周用開其端，不久便為汪瑗《楚辭集解》所沿用，歷明、清而不衰。在下文中，我們會逐一討論《楚詞註略》的特色。

四、對屈子人格的重新認知

明代前期，楊士奇避而不談《楚辭》；何喬新承朱子之說，指《楚辭》一書「醇儒莊士，或羞稱之」；李東陽云：「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這種觀點是一脈相承的。李東陽為武宗顧命之臣，尚屈於劉瑾的氣焰；周用為李氏的晚輩，正德間同處一朝，卻「內攻貂豎，外觸要津」，比對判然。而周用評價屈子，與臺閣諸老亦有不同。他雖然承認很多人眩惑於《楚辭》的文辭，進而模擬騁懷，卻指出這是讀者自己的問題，與屈子無關。換言之，臺閣諸老之論有本末倒置之嫌。此外，朱子對於屈子的一些非議，周用也不以為然。由於朱子在明代擁有崇高的地位，《楚詞註略》沒有直斥其非，但處處皆是回應朱子之論。現表列而觀之：

³⁰ 同註 15，頁 1b。

表一

	朱子《楚辭集註》〈目錄序〉	周用《楚詞註略》〈自序〉
志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其心忠，故終始以貞信自許，而不敢少忘其君。 ● 其志窮，故周旋迫切而無所容身，蓋以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亦卒命而已矣！
作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其情哀，故每作則糾纏鬱塞，往復再四，而不可離。
才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又其學本博極，故汗漫橫肆，足以明其心，宣其哀，而達其志。必如是而後已，非以文辭也。其言浮遊四極，若汨濫而無終窮。蓋曰吾既無所往，其惟宇宙之外，可容我乎？然無是也。其沉憂隱痛，於是乎在。

參詳「表一」，可見周用對屈子的評語十分正面，非朱註可比。論志行，朱子謂屈子行事過於中庸，不足爲法；而周用止著眼於其「忠」，絲毫不提中庸，且以爲屈子的狷介之行乃出於周旋迫切而無所容身的緣故，語調頗爲包容。論作品，朱子以屈作流於跌宕怪神，不可爲訓；而周用則稱其糾纏鬱塞，往復再四。心忠、情哀、志窮，實是屈子爲人如斯、《楚辭》爲書如斯的原因。這三端，朱子固然也有察覺。但朱子偏執於結果，聲稱《楚辭》離經；周用則兼重其原因，斷言屈子可慕，這是二人的不同之處。至於就論才學，朱子責屈子不知學於北方，周用讚其學本博極、汗漫橫肆。以周氏之見，屈子無所不知，則孔孟之學、中庸之道，也自當瞭然於心。二人見解可謂南轅北轍。但周用指出，屈子明儒理卻流於狂狷，是因爲他「宗

臣」的身份——宗臣是無去國之義的。³¹後來不少註家等皆著力闡發了這一點。如林雲銘〈楚辭燈凡例〉道：「讀《楚辭》先要曉得屈子位置，以宗國而為世卿，義無可去，緣被放之後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憂國憂民。」³²黃文煥則道：「原不死即不忠，別無可以不死之途，容其中立也。」³³身為宗臣，必須忠於王室，不得他去；然而到了如此地步，除了以死明忠之外，別無他法。因此，屈子這種自殺的狂狷之行乃是不得已而為的。

五、論屈子作品的創作年代

因時世久遠、文獻缺逸，屈子的生平事蹟已難詳考。但其作品的創作年代，又與生平關係密切，影響重大。周用深明此理，於《楚詞註略》每每論及此端。

關於〈離騷〉創作年代，自漢代以來便莫衷一是。金開誠比對司馬遷〈屈原列傳〉、劉向《新序》〈節士〉篇、班固〈離騷贊序〉、王逸〈離騷經序〉，指各說皆肯定〈離騷〉作於楚懷王時。³⁴王逸、朱子的〈離騷經序〉悉謂屈子遭懷王疏遠而作〈離騷〉，但皆未明言遭疏後是否放流。³⁵周用於〈自序〉開首便道：

屈子〈離騷〉，既放而追敘之辭也。³⁶

又言：

³¹ 同註 15，頁 2a：「『帝高陽』二句，言己為楚之宗臣也。」

³² [清]林雲銘：〈楚辭燈凡例〉，《楚辭燈》（清康熙抱奎樓刊本）凡例，頁 3a。

³³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合論》（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順治十八年(1661)補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頁 5b 至 7a。

³⁴ 金開誠：《屈原辭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頁 94 至 95。

³⁵ [漢]王逸〈離騷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信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見[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重印修訂本），頁 1 至 2。

³⁶ 同註 15，頁 1a。

《史記》曰：「屈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不悟也。」則是原在懷王時已放流，故作〈離騷〉。³⁷

周用以爲屈子作〈離騷〉而「冀幸君之一悟」，表示他對懷王仍抱有幻想，因此斷定屈子見疏後，楚廷實有放流之舉，而〈離騷〉的創作年代就在放流不久之時。針對這個論點，今人毛慶批評道，周用的話不符合〈屈原列傳〉的實情。司馬遷於「王怒而疏平」後接著寫「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明確記載〈離騷〉是作於見疏之後，懷王之時。而周用所引一段在後，在懷王已卒、頃襄王即位以後。大約周用認爲「一篇之中」的「一篇」是指〈離騷〉，然此論不確。³⁸毛氏以爲，周用沒有注意〈屈原列傳〉陳述的先後次序，且把屈作「一篇之中三致意」的特色僅僅當成是〈離騷〉一篇的特色。³⁹近代以來，一直有學者懷疑〈屈原列傳〉有竄亂之處。周用所引的這段，聶石樵就指出是「對〈離騷〉寫作意圖及懷王不聽忠諫的結果的說明」。⁴⁰至於古代學者，雖然並無這樣的懷疑，但有人認爲這一段是對前文有關〈離騷〉的補充。⁴¹因此，周用斷言〈離騷〉作於懷王之時、放流之後，是可以理解的。他很清楚，〈離騷〉的語氣仍帶有希冀，不可能是屈子的晚年作品。

至於其他篇章，王逸、朱子認爲大都創作於江南的沅湘之間。而周用考察文意，認爲〈離騷〉以外，〈九歌〉也應作於初放之時：

〈九歌〉之作，疑亦在是時（案：指作〈離騷〉之時），其辭猶有望焉。至

³⁷ 同註 15，頁 4a 至 4b。按：周氏此處所引與原文略有出入。

³⁸ 同註 24，頁 41。

案：〈屈原列傳〉言屈子在懷王朝受上官大夫排擠，以致遭到懷王疏遠。這段時間，屈子大概一度謫居到漢北，但尚可自由行動，並非放流。〈列傳〉云「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可見仍有官職在身。屈子正式放流是在頃襄王時：「今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周用所引的一段，在頃襄王即位以後，且明確有「放流」字樣，可見屈子雖依舊「心繫懷王」，卻已身處頃襄之世。參褚斌杰：《楚辭要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初版），頁 25。

³⁹ 案：古代學者並不以「一篇之中三致意」專指〈離騷〉。如清林雲銘註〈屈原列傳〉此處云：「連〈天問〉〈招魂〉〈哀郢〉諸篇俱在內。」（見《古文析義合編》（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清木石印本，2001年九版），頁 166。）

⁴⁰ 聶石樵：《屈原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頁 30。

⁴¹ 如林雲銘道：「前段敘作〈離騷〉，止寫其文辭，志行都在屈原自處上見。此處必把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一片孤忠極力描寫，方盡得上文憂愁幽思四字之奧。」（同註 28。）

襄王又遷江南，復有〈天問〉以下等篇，則悲痛殆絕矣。⁴²

所謂「猶有望」，周氏於〈九歌〉解題一則中申釋道：

（〈九歌〉各篇）其周旋勞苦、徘徊延佇、求之不得而不得已者，尤原之所致意者也。⁴³

我們由這兩段文字還可知道：周氏以〈九歌〉與〈離騷〉的辭氣比較接近，故應作於同時。由於文中流露出「猶有望」的心態，他推測屈子此時放流不久，尙未遷於江南。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諸篇，辭氣不類〈離騷〉、〈九歌〉，周用則斷言創作於頃襄之世、江南之野。這些篇章中又以〈天問〉的創作時間最早：

蓋原此篇作於〈離騷〉、〈九歌〉之後，而迫切之情尤有甚焉。⁴⁴

認為〈天問〉的辭氣比〈離騷〉〈九歌〉迫切，但又不及〈九章〉諸篇「悲痛殆絕」，因此應當作於〈九歌〉之後、〈九章〉之前。聶石樵以為〈天問〉並沒有放逐的痕跡，只是抒發了一些憤懣和失意的情緒，可能是屈子被讒去職後到漢北所作。⁴⁵這種見解在今天較為學者所接受。周用僅根據文辭的緩促來推斷〈天問〉的作年，並不太科學。

總體而言，周用對屈作年代的推斷主要援引了《史記》和屈作本文為證。這與後來很多註家如黃文煥、林雲銘、蔣驥等逐篇考定創作年代的方式是一致的。然而，由於周用之說大都點到即止，沒有進一步的闡發，所以尙欠精詳，且有武斷之嫌。

⁴² 同註 15，頁 4b。

⁴³ 同註 15，頁 56 至 6a。

⁴⁴ 同註 15，頁 9b。

⁴⁵ 同註 40，頁 151。

六、論篇章的命名與篇旨

(一) 篇章命名

歷來楚辭學的另一個焦點——篇章命名問題，《楚詞註略》也有論及。此書第一則便對各篇章的命名作出了通盤的推斷：

〈離騷〉，《史記》曰「猶離憂也」，蓋本篇有「余既不難夫離別」之言，與〈東皇太乙〉至〈禮魂〉、〈惜誦〉至〈悲回風〉、〈遠遊〉至〈漁父〉及〈天問〉，皆原自命。〈離騷〉曰經，曰〈九歌〉〈九章〉，為後人所加。〈九歌〉蓋因首篇「九辨九歌」，又合〈湘君〉〈湘夫人〉〈太司命〉〈少司命〉為二篇故；下宋玉則取〈九辨〉自命其辭。⁴⁶

〈離騷〉之名乃司馬遷、班固所用，王逸《章句》則稱之為〈離騷經〉。洪興祖、朱子對《章句》雖有質疑，直稱「經」字為後人所加，但在其註本中仍然保留了經、傳的名目。及至周用之書，便毅然不用〈離騷經〉之名。其後汪瑗、黃文煥、李陳玉等註家皆是如此。至於周氏解「離騷」二字則有欠穩妥。他的說法明顯和王逸「離，別也；騷，愁也」的故訓是一致的，卻援引《史記》為解。實際上，《史記》「離憂」與《楚辭》「進不入以離尤」、「思公子兮徒離憂」等句一樣，「離」解作「遭」，並非王逸「離別之憂愁」的意思。因此，「離憂」即「遭憂」之義。周用拈出「余既不難夫離別」一句為證，未免紆曲。

關於〈九章〉之名，周用認為是後人所加，這個意見源於朱子：「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⁴⁷觀王逸云：「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⁴⁸相比之下，朱子之說無疑更具說服力，因此得到後來大多數學者的支持。

然而，周用以〈九歌〉之名也是後人所加，就有臆測之嫌了。王逸謂屈子「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諷諫。」

⁴⁶ 同註 15，頁 4a。

⁴⁷ [宋]朱子：《楚辭集註》（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宋端平乙未(1235)刊本影印，1968年3月再版），頁 137。

⁴⁸ 同註 35，頁 121。

④⁹朱子〈楚辭辯證〉也以此名為屈子自定，又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⑤⁰}雖言不可考，但道出一個訊息：《楚辭》〈九歌〉、虞夏〈九歌〉皆祀神之曲，屈子〈九歌〉之名雖為自擬，實亦取於固有。周用也留意到〈離騷〉「啓〈九辯〉與〈九歌〉」之語，然見解大不相同。他認為屈子創作的二十五篇是各自獨立的。後人在〈離騷〉之外，合思君念國之篇為〈九章〉，合祭祀歌舞之辭為〈九歌〉。實際上，和〈九章〉不同，〈九歌〉十一篇具有連貫性，明顯是同時所作。否則很難解釋，屈子為甚麼要異時異地、斷斷續續地創作這些篇章。因此，周用此論僅因〈九章〉而推斷〈九歌〉的題目為後人所加，完全忽略了這組詩歌本身的性質和屈子創作的動機。

（二）篇旨分析

篇章命名之外，古今《楚辭》註家對各篇的主旨更是反覆爭論。如〈遠遊〉一篇的創作動機，王逸認為是由於屈子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於是深惟元一，修執恬漠，遂敘妙思而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又說他在篇中流露出懷念楚國，思慕舊故之情。^{⑤¹}可是，「懷念楚國」與「深惟元一」，二者之間是有很大抵觸的。王逸之意，蓋以此篇呈現了屈子依違於兩端的矛盾心情。而朱子則以為此篇全屬寓言，是屈子「悲嘆之餘」的作品，蘊含了長生久視之道，表現了「思欲制煉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的思緒。朱子之論似已偏向「深惟元一」一端，沒有了王逸所提出的那種矛盾心情。^{⑤²}對於前賢的解釋，周用並沒有盲從。他說：

《楚辭》為〈國風〉之變，而〈遠遊〉又〈離騷〉之變也。蓋〈離騷〉猶寄言君臣，其終也猶睠焉故都，則原之於楚猶有庶幾之望焉。於〈遠遊〉則言神仙輕舉，無復向之徘徊眷戀，而於所謂「忽臨睨夫舊鄉」者，則又沒其辭於篇間，而非究竟致意之言。故曰〈離騷〉之變也。雖然，原於向之所懷，

④⁹ 同註 35，頁 55。

⑤⁰ 同註 47，頁 353。

⑤¹ 同註 35，頁 163。

⑤² 同註 47，頁 197。

案：今人周秉高綜合闡發王、朱之論，認為〈遠遊〉所表達的「是屈原在政治上絕望之後所追求的一種內心解脫，是對當時楚國黑暗腐朽統治集團的控訴、抗議，也流露了對故國的熱愛、留戀之情。但從總體上講，是企圖擺脫現實，是〈離騷〉思想的退坡。」見《楚辭解析》（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初版），頁 219。

豈其少改乎？誠以疾痛號呼，無所不至，終無以自明，致命遂志，信誓不可越，乘化歸盡，於吾蓋無毫髮之憾。跡雖幾於愈疏，其蓄極而通、哀極而樂，人窮反本，乃知生死一致，奈何畏懼？「知死不可讓而無愛」者，於此又可以驗其言之有自，而不變其初心也。⁵³

前文已言，周用論及〈離騷〉中的遊歷道：「後世詞人，擬遊仙等作，以騁浩蕩之懷，以爲本於〈離騷〉，屈子之志荒矣！」對於〈遠遊〉，他依然堅持全篇所帶出的不是神仙之說，而是生死之道。屈子並非有求仙之志，而是通過對這些境界的描繪表達自己對楚國俗世的徹底絕望。故此，此文雖與〈離騷〉一樣有神游的內容，也出現了「忽臨睨夫舊鄉」的句子，卻已經沒有〈離騷〉那種牽掛之情。這時的屈子，對自己的生死去留已有周備的審思，〈懷沙〉「知死不可讓，願無愛兮」之語就是極好的註解。當然，周用也指出：屈子的絕望，正是對於先前拳拳寄望的一種逆反。他對〈遠遊〉篇旨的解說，依然是側重於「懷念楚國」這一端的。

又如〈天問〉篇的創作動機，王逸所謂呵壁問天，以渫憤懣的說法爲大多數學者所贊同。周用的意見則與王逸不盡相同：

〈天問〉是因先以天為問，故以命篇，非以通篇為問天也。⁵⁴

又云：

自遂古之初以下十一章，皆因天設問，此非原本意，特假此發端，猶是婉辭。

⁵⁵

認爲前段有關自然現象的發問，只是後文的發端、鋪墊。聶石樵說：「〈天問〉中有些詩句固然有諷諫意義，有些則與諷諫無關。」⁵⁶正中周用之意。周氏指出，人事的興替才是屈子所在意之處：

⁵³ 同註 15，頁 18a 至 18b。

⁵⁴ 同註 15，頁 11a。

⁵⁵ 同註 15，頁 10a。

⁵⁶ 同註 40，頁 150。

羿、澆、桀、紂、妹嬉、褒姒、箕子、比干之事，正其所致意者，指摘殆盡。天所諱隱，乃驟引而置之有無絕續之間，以為人有知我者，如是足矣。⁵⁷

這些歷史陳跡雖然不堪回首，乃至於上天都想有所諱隱，但卻是斑斑可考、歷歷在目的。楚國君臣將歷史教訓完全置之不顧，沉溺於歌舞昇平，諱疾忌醫，更對清醒者進行無情打壓，這正是屈子需要洩憤的原因。明末李陳玉論〈天問〉第一大段道：「屈子非不知其故，特欲問下面人事種種，先為是迂遠之言，此文字之妙也。」⁵⁸無疑受到了周用的影響。

順帶一提的是，對於〈天問〉的取材，周用有這樣的說明：

屈原此篇，蓋取古昔世代明白可鑒之跡，間以巫史鬼物譸張不經之書，俚俗口耳茫昧無稽之說，美惡雜陳，先後易置，是以歷世既久，其文遂多不可解，而其篇章首尾則猶存。⁵⁹

現代學者或指出，〈天問〉確有楚國和上古的神話傳說成分，但絕非取之「譸張不經之書」、「茫昧無稽之說」，進而認為周用對〈天問〉的基本理解尚有問題。⁶⁰不過在儒學主導的時代，將上古神話傳說斥為荒誕不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我們似難要求古人像近百年來的學者一樣結合出土文物及有關史料，證明〈天問〉並非不可解，相反有著極重要的科學史、民族史及文化史之價值。其次，總觀周用整體的論述，所謂「巫史鬼物譸張不經之書，俚俗口耳茫昧無稽之說」主要是針對第一段的自然現象而言。至於和人事相關的掌故，他都是歸於「古昔世代明白可鑒之跡」的。

七、論〈九歌〉的篇數與內容

本文第六節所引《楚詞註略》第一則，還涉及了另一討論主題——〈九歌〉篇數問題。〈九歌〉〈九章〉名皆有九字，後者九篇，前者十一篇。若

⁵⁷ 同註 15，頁 9b。

⁵⁸ [明]李陳玉：《楚詞箋註》（康熙十一年(1672)魏學渠刊本）卷二，頁 4a。

⁵⁹ 同註 15，頁 9a 至 9b。

⁶⁰ 同註 23，頁 42。

〈九歌〉之九爲實數，則與篇數有差；爲虛數，則與〈九歌〉之名不侔。王逸於〈九歌序〉中未言所以然。《文選》張銑註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矣。」⁶¹ 洪興祖從之。⁶² 姚寬亦謂〈九歌〉之「九」如〈七發〉〈七啓〉之「七」一般，係以數名之，而非以章名之。⁶³ 朱子〈楚辭辨證〉則道：「篇名〈九歌〉，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爲陽數者，尤爲衍說。」⁶⁴ 對此說表示存疑，態度客觀。而明代主虛數說者，除楊慎外，少有所聞：「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耳。」⁶⁵ 林兆珂解〈九歌〉時亦徵引姚寬之說。⁶⁶ 而可考知的明清楚辭學者中，周用爲主實數說的第一人。周用以二〈湘〉合一、二〈司命〉合一而得九之數。⁶⁷ 其後學者以主實數者爲多：汪瑗、王夫之合二〈司命〉爲一，以〈禮魂〉爲前十篇之亂辭；黃文煥、林雲銘、蔣驥以〈山鬼〉、〈國殤〉、〈禮魂〉爲一篇；錢澄之以河非楚望、山鬼妖邪，去而得九章；⁶⁸ 諸說紛紜，不一而足。

回顧〈九歌〉之內容，王逸謂屈子係「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之以諷諫」。⁶⁹ 朱子亦言其「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⁷⁰ 皆以〈九歌〉原本性質爲祀神樂曲。周用則對「事神」作出了較詳細的劃分：

〈九歌〉，迎神、享神、送神之詞。⁷¹

⁶¹ [梁]蕭統選編、[唐]李善等註：《六臣註文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初版），頁597。

⁶² 同註35，頁182。

⁶³ 見[宋]姚寬：《西溪叢語》（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頁6。

⁶⁴ 同註47，頁353。

⁶⁵ [明]楊慎：《升菴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70-310。

⁶⁶ [明]林兆珂：《楚辭述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影印初版），頁95。

⁶⁷ 周用之說，陳子展有所提及：「至若明初周用《楚詞註略》說：『〈九歌〉又合〈湘君〉、〈湘夫人〉、〈太司命〉、〈少司命〉爲二篇。』」（見《楚辭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452。）然周用生於成化時，活躍於正德、嘉靖間，非明初時人。

⁶⁸ [明]錢澄之：《莊屈合詁》（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初版），頁220。

⁶⁹ 同註35，頁55。

⁷⁰ 同註47，頁59。

⁷¹ 同註15，頁5b。

案：入清以後，學者對〈九歌〉是否祀神樂曲也產生了爭論。如戴震論〈東皇太一〉云：「蓋自戰國時奉爲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也。」（見《屈原賦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初版），頁23。）

通過迎、享、送神三點，周氏將十一篇進行了歸類：

〈湘君〉、〈湘夫人〉、〈山鬼〉，言迎神；〈東皇太乙〉、〈國殤〉、〈禮魂〉，言享神；餘兼迎送。⁷²

周用所定迎、享、送神的標準何在，註文並未說明，大抵是玩味文本、參詳舊註後所得。嘗試論之，如〈東皇太一〉「穆將愉兮上皇」到「君欣欣兮樂康」都沒有明確描述到神的降臨與離去，故周用以爲只有「享神」部分。〈湘君〉一篇，朱子以爲「言湘君既不可見，而愛慕之心終不能忘」。等待許久，神終不來，故周用認爲此篇只言迎神。至於〈雲中君〉、二〈司命〉、〈東君〉、〈河伯〉五篇，諸神的迎、享、送都層次分明，周用云「兼迎送」，也包括了「享」這一步驟。對於這一點，毛慶認爲「確可補朱熹之缺」。⁷³

其後，明末李陳玉亦有類似的說法：「（〈九歌〉）有迎神、降神、送神全者，〈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是也；有迎神、降神、無送神者，〈東皇太一〉是也；止有迎神、無降送者，〈湘君〉、〈湘夫人〉是也；無迎無送無降者，〈山鬼〉、〈國殤〉、〈禮魂〉是也。」⁷⁴ 迎、享／降、送神，就是神靈來、留、去的三個階段。享神、降神意雖有別，然皆著眼於神留之時。兼迎送則神必曾降；神降則必曾享，無須置疑。總而論之，有關〈九歌〉迎降送神之說，李陳玉於《楚詞註略》應有參詳損益，而其立論同樣也是以玩味文本爲基礎。如其論〈湘夫人〉云：「此章與前篇（〈湘君〉）用意俱同，皆是迎神，而極寫神不肯來之狀。」⁷⁵ 爲便審覽周、李二氏之論，謹表列於下：

⁷² 同註 15，頁 5b。

⁷³ 同註 24，頁 42。

⁷⁴ 同註 58，卷三，頁 13b。

⁷⁵ 同註 58，卷三，頁 6b。

表二

	周用《楚詞註略》			李陳玉《楚詞箋註》		
	迎神	享神	送神	迎神	降神	送神
〈東皇太一〉	--	√	--	√	√	--
〈雲中君〉	√	√	√	√	√	√
〈湘君〉	√	--	--	√	--	--
〈湘夫人〉	√	--	--	√	--	--
〈大司命〉	√	√	√	√	√	√
〈少司命〉	√	√	√	√	√	√
〈東君〉	√	√	√	√	√	√
〈河伯〉	√	√	√	√	√	√
〈山鬼〉	√	--	--	--	--	--
〈國殤〉	--	√	--	--	--	--
〈禮魂〉	--	√	--	--	--	--

觀〈雲中君〉、二〈司命〉、〈東君〉、〈河伯〉五篇內容，周、李皆言神有來有去，即所謂「兼迎送」者，而二〈湘〉則僅有迎神。二人之解會頗有類似之處。他如黃文煥、錢澄之等也以〈九歌〉內容為迎、降、送神。然以〈少司命〉一篇為例，黃氏意此篇乃「神宿帝郊而遁我，我登九天以求神」，⁷⁶ 錢氏則謂「神欲降而不降」，⁷⁷ 解會已截然不同，益可證周、李所論相近。唯周用認為〈東皇太一〉開篇時神已降臨，故無須迎；李陳玉則云：「自『瑤席』句至末，言迎神宴舞之樂。」⁷⁸ 這自然是由於二人對文本的理解有所不同。此外，李氏以〈山鬼〉、〈國殤〉、〈禮魂〉三篇迎降送皆無，細觀內容，其實未然。李陳玉蓋以三篇為鬼祭，⁷⁹ 迎降送神的名目並不適用。周用以山鬼為神，下文另詳。而其稱〈國殤〉「為壯厲之辭，以道死者之志」；⁸⁰ 〈禮魂〉無註，蓋從洪興祖舊說，以祭主為「以禮善終者」。那麼在周用看來，國殤、禮魂雖為凡人之亡靈，卻並不妨礙其為神。

⁷⁶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明刊本影印，1986年初版），頁302。

⁷⁷ 同註68，頁209。

⁷⁸ 同註58，卷三，頁2b至3a。

⁷⁹ 同註58，卷三，頁13a。

⁸⁰ 同註15，頁9a。

周用以〈河伯〉〈山鬼〉並稱，謂「猶概言山川之神，無所輕重」。⁸¹雖然沒有詳細申述，卻很值得注意。王逸、朱子皆以河伯為黃河之神，⁸²山鬼係木石之怪。⁸³而周用似已否定王、朱之說。先看河伯，周氏應以其為普通水神（而非黃河之神），否則不會稱他「無所輕重」。直至近世，學者方提出類似的意見。山鬼方面，周用分析〈山鬼〉時始終以「神」稱之。⁸⁴然直至清末，主山鬼為神者依舊為數寥寥。⁸⁵近人郭沫若謂山鬼為巫山神女，姜亮夫也道：「〈山鬼〉祭的不是『鬼』而是山中女神。」⁸⁶周用說山鬼「無所輕重」，自然不會將之和地位顯赫的巫山神女聯繫起來。然而，認為「鬼神可以通稱」，不再簡單地把山鬼看成山魃，《楚詞註略》在諸家中年代是比較早的。

八、論《楚辭》的文學特色

（一）章法分析

錢澄之指出《集註》一書「逐句解釋，不為通篇貫串」。⁸⁷當然，除了解釋之外，朱子也以賦比興之法辨探〈離騷〉。但總體而言，他對於《楚辭》的詞章分析似乎只限於此。這是因為歷來認為詞章乃雕蟲小技，如王陽明評宋謝枋得《文章軌範》道：「蓋古人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爾。」⁸⁸四庫館臣論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云：「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為初學之門徑。」⁸⁹皆以評註點竄之術洩漏天機，於章法上錙銖考核，不過是初學入門之法。南宋以迄明中葉，《楚辭》註本數量有限，且亡佚頗

⁸¹ 同註 15，頁 9a。

⁸² 同註 35，頁 78；同註 47，頁 85。

⁸³ 同註 35，頁 82；同註 47，頁 87。

⁸⁴ 同註 14 頁 8b 至 9a：「〈山鬼〉『若有人』二章，設言神之慕己、而已往來之久矣，而不來也；『表獨立』二章，言神不過上下相山何以不來者，豈有所悅慕而望我乎？末章言幽思不能忘也。」

⁸⁵ 案：比較為人熟知的，只有明汪瑗、清顧成天兩家之說。汪瑗云：「蓋鬼神可以通稱也。此題曰山鬼，猶言山神山靈云耳。」（見汪瑗：《楚辭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初版），頁 137。）顧成天云：「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曰瑤姬。通篇辭意似指此事。」（見[清]顧成天：《楚詞九歌解》（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乾隆六年(1741)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頁集 2-276。）

⁸⁶ 姜亮夫、姜昆武：《屈原與楚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頁 65。

⁸⁷ 同註 68，頁 139。

⁸⁸ [明]王守仁：〈重刻文章軌範序〉，見[宋]謝枋得：《文章軌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緒九年(1883)置絃歌書院刊本，1991年初版）。

⁸⁹ 同註 5，頁 1719。

多，而總集編選者亦多未顧及《楚辭》。故傳世著作中，《楚詞註略》是《楚辭集註》後之第一本較具規模地分析屈作章法的著作。《楚詞註略》論及章法的篇幅甚鉅，關涉了〈離騷〉、〈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天問〉、〈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遠遊〉、〈卜居〉等十九篇，或就全篇而論，逐一探討各章的意義與起承轉合的手法；或就個別有疑問的詞句而論，在有需要時另開新則。故毛慶認為：「如此分章剖析卻較為好學易懂。」⁹⁰

以〈哀郢〉篇為例，朱註非常詳盡。各章之內，每句都是先釋字義，再釋句意。如十五章，先釋「慍惓慷慨」之義，再引洪興祖《補註》以解前二句；復釋「踈蹠」之義，再解後二句。然而，句釋僅是詞釋的衍申，並非就論章法而言，稍為支離。至於各章的相互關係，也鮮有貫穿一氣的講解。而周用之註則云：

〈哀郢〉「皇天之不純命」四章，追敘去國之始，徘徊眷戀，臣子不忍之情。「心嬋媛而傷懷」二章，反覆言流亡未知所止，不能為心之甚。「將運舟而下浮」二章，言遂欲遠去，而此心益不忍忘乎故國也。「登大墳以遠望」四章，言升高反顧，寓目興感，無已解憂，所向瞽惑，不知所適。而國之將亡，吾亦無如之何，是以憂心相仍，不忍遠去，離久而此心不能舍也。「外承歡之汨約」三章，言我之遠遷實因小人之壅蔽，無所不至，是以往於此也。亂辭所及，其攀慕垂絕之音，抑亦有無窮之悲焉。⁹¹

雖略於訓詁，卻能提出各章間的關聯，進而加以概括，分全篇為六個層次，歸結每層的大意。《集註》以訓釋為主，所言較客觀；《註略》更偏向文章欣賞，行文時帶感情。如評價亂辭為「攀慕垂絕之音」、「有無窮之悲」，主觀的色彩比較強烈，與稍後陸時雍、陳繼儒、蔣之翹等《楚辭》評點家的文字風格比較接近。

在為屈作概括層次、分析章法的同時，周用還有一些創見。如他解〈抽思〉篇，認為「『亂曰』以下與前『少歌』一意，皆總上文意」。⁹²解〈思

⁹⁰ 同註 24，頁 42。

⁹¹ 同註 15，頁 13a 至 13b。

⁹² 同註 15，頁 14b。

美人〉，指出「『開春發歲』至終篇（與前段）大義略同」，又申言此篇所以深長，是因為「如《詩》反復疊詠之體」。⁹³引《詩》為證，將司馬遷「一篇之中三致意」之舊說推進了一步。這些見解不久便產生了影響。如黃文煥道：「〈思美人〉以變易為複，以情志心度為複。」「〈抽思〉以詞言為複。」⁹⁴同於周用之意，而所論更詳。陸時雍評〈抽思〉：「此篇凡三致意於良媒矣。」⁹⁵也與周氏所見略同，以〈抽思〉可分為三個內容相近的層次。今人陳子展稱〈抽思〉為兩篇合而為一，⁹⁶亦是承此思路而來。

然而，周用分層析章的工作也有缺失之處。如〈湘夫人〉「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四句，朱子定為一章，周用從之。實際上，這四句雖然押韻，但前兩句與後兩句的文意有所不同。周用全盤接受朱子之說，似欠熨貼。

（二）詞句分析

對於一些詞句的見解，周用時有新意。如〈離騷〉中，屈子、靈氛對話的一段有「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兩句，朱子謂係屈子聞靈氛忠告後的自念之詞。⁹⁷周用卻認為：「『世幽昧以眩曜』二句正申『爾何懷乎故宇』，意亦靈氛之言。」⁹⁸〈湘君〉「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二句，朱子稱此為巫者「恐行或危殆，故願湘君令水無波而安流也」。⁹⁹周用同樣以為篇中之「我」為巫者，但卻指出：「『令沅湘』二句，言『我』令之使之也。」¹⁰⁰這些皆是周用細味全篇後所得。

周用好以「比類而觀」之法推敲詞義句義，每有所獲。註〈少司命〉道：「『媿人』，猶〈湘夫人〉篇『佳人』，謂神也。」¹⁰¹又註〈河伯〉道：「『美人』與『予』，皆指神。『予』與〈太司命〉『予』、『余』同，親之辭也。」

⁹³ 同註 15，頁 15b。

⁹⁴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合論》（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順治十八年(1661)補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頁集 1-568。

⁹⁵ [明]陸時雍：《楚辭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影印本），頁 180。

⁹⁶ 陳子展云：「〈抽思〉一篇的結構形式頗覺特別，既有『少歌』，像《荀子·僇詩》的小歌，這和亂辭的意義相同，可說一篇作品到此已經結束了。偏偏又從『倡曰』更端再起，末了還有亂辭作結。這當是兩篇合而為一。」（同註 55，頁 574。）

⁹⁷ 同註 47，頁 44。

⁹⁸ 同註 15，頁 5b。

⁹⁹ 同註 47，頁 65。

¹⁰⁰ 同註 15，頁 6b。

¹⁰¹ 同註 15，頁 7b。

⑩₂ 觀《楚辭集註》中，朱子謂〈湘夫人〉中「佳人」指湘夫人，⑩₃ 〈少司命〉中「媿人」指巫，⑩₄ 〈河伯〉中「美人」與「予」皆巫自謂，⑩₅ 〈大司命〉中「予」則是「贊神者爲其自謂之稱」。⑩₆ 朱子多逐篇獨立釋意，故所解比較細碎。而周用則引原文交相爲內證，解會自然不同。又〈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兩句，王逸註道：「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懸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⑩₇ 周用以爲：「『朝發軔於蒼梧』，與本篇『朝發軔於天津』、〈遠遊〉『朝發軔於太儀』，皆取遼遠之意。王逸獨取『蒼梧』，義係於舜，未然。」⑩₈ 朝發蒼梧，夕至懸圃，意謂路途遙遠，而一去竟日。「蒼梧」二字充其量僅可說承上啓下，未必如王逸所言，有受道於帝舜之意。再如〈東君〉「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朱子解道：「下方所陳鐘鼓竽瑟聲音之美、靈巫會舞容色之盛，足以娛悅觀者，使之安肆喜樂，久而忘歸。」⑩₉ 認爲體現出祭祀者與神遇合的歡喜之意。周用則稱：「猶〈湘夫人〉『蹇誰留兮中洲』，與〈河伯〉『日將暮兮悵忘歸』、〈山鬼〉『留靈修兮憺忘歸』、『怨公子兮悵忘歸』詞意皆同。凡曰『歸』者，內之辭也。」⑩₁₀ 又云：「『駕龍輶』一章，恐其爲他人所留而不來也。」⑩₁₁ 指出〈東君〉篇有著與其餘諸篇一樣的離合懷思之情。

然而，某些詞句的文字雖然相近，其意卻有所不同。如周用以〈離騷〉「倚閭闔而望予」與〈遠遊〉「排閭闔而望予」意同，來證〈離騷〉此處無倚門拒我不得入意。⑩₁₂ 朱子註〈遠遊〉謂：「排，推也。望予，須我來也。與〈騷經〉『倚閭闔而望予』者意不同矣。」⑩₁₃ 明瞭「倚」「排」二字所訓不同，致兩句意有相差。而周用僅以兩句皆有「閭闔」、「望予」字樣，便稱其意同，不啻倉猝。故毛慶評論道：「如此聯繫考索，所得結論均與常解不同，其結論雖未必可取，然其方法卻實值得參考。」⑩₁₄

⑩₂ 同註 15，頁 8b。

⑩₃ 同註 47，頁 71。

⑩₄ 同註 47，頁 79。

⑩₅ 同註 47，頁 84。

⑩₆ 同註 47，頁 74。

⑩₇ 同註 35，頁 26。

⑩₈ 同註 15，頁 5a。

⑩₉ 同註 47，頁 80 至 81。

⑩₁₀ 同註 15，頁 8a。

⑩₁₁ 同註 15，頁 8a。

⑩₁₂ 同註 15，頁 5a。

⑩₁₃ 同註 47，頁 206。

⑩₁₄ 同註 24，頁 42。

九、詞語訓釋

《楚詞註略》一書中，字詞訓釋非首要事，然亦偶有新意。如〈懷沙〉「吾將以爲類兮」一句，王逸註云：「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¹¹⁵朱子《集註》從之：「類，法也。以此言爲法也。」¹¹⁶然不復引《詩》爲證。按「永錫爾類」句出《詩三百》之〈大雅·既醉〉，《毛傳》訓「類」爲「善」。¹¹⁷朱子於《詩集傳》釋「類」字，實本於《毛傳》之說：「類，善也……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¹¹⁸但這樣一來，《集註》與《詩集傳》之說就有牴觸。周用則謂「類」字「若與《左傳》所引《詩》『永錫爾類』意同」，¹¹⁹點出此處「類」字用法同於《毛詩》。

又如「乘騏驎而馳騁兮」一句，分別見於〈離騷〉、〈惜往日〉兩篇。〈離騷〉篇中，王逸註「騏驎」曰「駿馬」，然註〈惜往日〉篇則云「駑馬」，¹²⁰自相矛盾。朱子《集註》竟爾從之。¹²¹周用駁斥道：「『乘騏驎』若泛云乘馬亦是，不必頓作『駑馬』與『泛汭』對。《楚辭》措詞，往往參錯礪硯。」¹²²毛慶認爲此論主張根據不同體裁不同寫作背景來訓釋詞句，其精神無疑正確，亦合訓詁要則。¹²³

再如洪興祖補註〈卜居〉篇，「呶訾」謂「以言求媚」，栗訓「謹敬」，「斯」訓「慄」、「喔咿儒兒」爲「強笑之貌」、「突梯滑稽」謂「委曲順俗」、「如脂如韋」訓滑柔、「絜楹」言諂諛，¹²⁴朱子《集註》大抵從之。¹²⁵兩註大都逐字求義。周用則以爲：「『栗斯』與『呶訾』、『喔咿儒兒』大意同，皆連綿字。」「『絜楹』承『突梯滑稽』、『脂韋』言，蓋亦皆連綿字意。」¹²⁶

¹¹⁵ 同註 35，頁 146。

¹¹⁶ 同註 47，頁 172。

¹¹⁷ 見《毛詩詁訓傳》，頁 129；收入《漢魏十三經古註》（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影印初版）。

¹¹⁸ [宋]朱子：《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界書局本，1987 初版），頁 132。

¹¹⁹ 同註 15，頁 15a。

¹²⁰ 同註 35，頁 7、頁 152。

¹²¹ 同註 47，頁 4、頁 97。

案：毛慶云：其原因，乃在於第三句爲「乘泛汭以下流」。「泛汭」既爲木筏無疑，「騏驎」與之相對，則不好釋爲「良馬」。其後許多學者覺得此說實在不妥，仍作「良馬」解釋，然對下面「泛汭」又不好處理。（同註 23，頁 42。）

¹²² 同註 15，頁 16b。

¹²³ 同註 24，頁 42。

¹²⁴ 同註 35，頁 177。

¹²⁵ 同註 47，頁 215 至 216。

¹²⁶ 同註 15，頁 19b。

故後世林雲銘謂：「啞訾栗斯，啞啞嚙啞，突梯絜楹等語，王註不知其何所據。先輩謂當以意會之，斯得之已。」¹²⁷毛慶指出，除「脂」、「韋」都作連綿字不確外，其餘亦可成立。¹²⁸

不過，周用對於舊註、尤其朱子《集註》有異議時，大都不明確指出，只是陳述己見。前引「乘騏驎而馳騁兮」句便是一個例子。又如他比對〈離騷〉「絳婍直以亡身」與〈惜誦〉「行婍直而不豫」兩句，以「婍直」為褒義詞；¹²⁹而《集註》承王逸《章句》，訓「婍」為「很」，¹³⁰與周用之見相左。再如《集註》釋〈河伯〉「送美人兮南浦」，言「美人與予，皆巫自謂也」，¹³¹《楚詞註略》則謂「美人與予皆指神，予與〈大司命〉『予』『余』同，親之辭也」，¹³²類似情況，不一而足。周用之時，朱註仍頗具權威，《楚詞註略》未敢直接指摘，是可以理解的。

十、結語

明代中葉以來，註《騷》風氣蔚盛。周用《楚詞註略》一書居此風氣之初，不錄屈作原文，僅有十九頁，筆記四十一則，且缺乏完備的體例，不足之處時而可見。前文談論到，周用誤解了〈離騷〉的名義，認為〈九歌〉之名乃後人所加，過於倚賴「比類而觀」的方法（如將〈離騷〉「倚閭闔而望予」跟〈遠遊〉「排閭闔而望予」全然等同），對於某些不合理的舊說聽之任之，乃至於對很多論點都沒有詳細申論，這些都是此書的缺失。次者，由於《楚詞註略》一書採用筆記體，又僅限於朱子所定的屈作二十五篇，一些重要的論點於是沒有闡發的空間。如二〈招〉方面，司馬遷悲〈招魂〉之志，王逸謂〈大招〉為屈作，朱子則一歸宋玉，一歸景差。周用註釋既只限於屈作，對二〈招〉卻不加論述，實有未安。

不過，有學者由於看到這些缺失而斷定《楚詞註略》獨到之處不多，

¹²⁷ 同註 32，卷四，頁 13a。

¹²⁸ 同註 24，頁 42 至 43。

¹²⁹ 同註 15，頁 4b 至 5a。

¹³⁰ 同註 47，頁 28。

¹³¹ 同註 47，頁 84。

¹³² 同註 15，頁 8b。

所析各篇具有之特點亦少，¹³³如此論調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將此書與明清眾多的楚辭學著作等量齊觀。假使從歷時的角度來看，得到的結論卻未必一樣。《楚詞註略》的寫作年代僅次於桑悅的《楚辭評註》。桑悅活躍於成化、弘治的「治世」，他註《楚辭》是爲了抒渫沉淪下僚的不忿。桑氏感覺到衰世的來臨，在文學上早早洗卻臺閣流風，被後代視爲師古說的先驅人物。而周用仕宦於朝綱不振的正德、嘉靖兩朝，七子師古說和陽明心學興起未久，傳統的臺閣文學和程朱理學雖已衰落，卻仍有很大的影響力。周用身爲臺閣文學的殿軍，改變了歷來閣臣對《楚辭》不聞不問、淺論輒止的態度，著手註解。這不僅呈露出一個端亮有節概的官員在衰世的抑鬱，更體現了當時文風、學風移轉的軌跡。

站在楚辭學的角度來看，周用以前，明人楚辭學著述只有桑悅《楚辭評註》一種。此書主觀性評點的內容甚多，且從未付梓，影響不大。與周用同時馮惟訥的《楚辭旁註》，唯標以音叶而無註文。相比之下，《楚詞註略》篇幅雖然簡短，卻有一己之見。周用針對舊註「領其要」、「祛其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他重新審釋各篇的大旨，分層剖析章法，運用「比類而觀」的方法研究詞句，得出了一些新的見解。關於〈九歌〉的創作年代、篇數問題、迎降送神步驟、以及河伯、山鬼等神的司職，也有不同於舊註的論斷。這些見解與稍後的汪瑗《楚辭集解》、陸時雍《楚辭疏》、黃文煥《楚辭聽直》、李陳玉《楚詞箋註》等相比，也許微不足道。但《楚詞註略》依然有開創性的功勞：其一，王逸《章句》面世以來，幾乎沒有《楚辭》註本單論屈作；而《註略》所論至〈漁父〉而止，僅限於屈作二十五篇，這在明清楚辭著作中具有先導性。其二，周用徹底擺脫了臺閣先輩的成見，對屈子的人格和學問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對其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並委婉地否定了朱子一些不合理的論說。其三，周用論屈作以詞章爲主，打破朱子以義理爲主的傳統。詞章分析的辦法，其後得到眾多楚辭學者的採用。這些都值得我們注意。

《楚詞註略》一直到清初方才付梓，但其中不少論點都與晚明的楚辭學者有契合之處。至於李陳玉《楚詞箋註》、黃文煥《楚辭聽直》的一些論點，如〈九歌〉迎降送神的內容、〈天問〉的篇旨章法、〈抽思〉〈思美人〉前後文的重複等，更明顯受到了《註略》的影響。和明代後期諸評註相比，

¹³³ 同註 24，頁 41。

《楚詞註略》固然沒有汪瑗《楚辭集解》的大膽假設、陸時雍《楚辭疏》的靈動清麗、王夫之《楚辭通釋》的微言大義、周拱辰《離騷草木史》的好奇務博。但我們依然可以斷言，這本小書的出現，不僅標誌著道學對明代臺閣文風影響的日益微弱，更預示了明清楚辭學興盛期的到來。

參考書目

1. [明]周用：《楚詞註略》，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1652)周之彝刊本
2.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重印修訂本
3. [宋]朱子：《楚辭集註》，臺北：藝文印書館據宋端平乙未(1235)刊本影印，1968年3月再版
4. [明]馮惟訥：《楚辭旁註》，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
5. [明]林兆珂：《楚辭述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影印初版
6. [明]蔣之翹編：《七十二家評楚辭》，天啓六年(1626)刻本
7. [明]陸時雍：《楚辭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影印初版
8. [明]李陳玉：《楚詞箋註》，康熙十一年(1672)魏學渠刊本
9.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據明刊本影印，1986年初版
10.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合論》，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順治十八年(1661)補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
11. [明]錢澄之：《莊屈合詁》，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初版
12. [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上海圖書館藏嘉慶六年癸亥(1803)聖雨齋刊本
13. [清]林雲銘：《楚辭燈》，清康熙挹奎樓刊本
14. [清]顧成天：《楚詞九歌解》，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乾隆六年(1741)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
15. [清]戴震：《屈原賦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初版
16.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新一版

17. 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
18. 潘嘯龍、毛慶主編：《楚辭著作提要》，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初版
19. 郭沫若：《屈原研究》，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版
20. 陳子展《楚辭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21. 姜亮夫、姜昆武：《屈原與楚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22. 聶石樵：《屈原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
23. 金開誠：《屈原辭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
24. 褚斌杰：《楚辭要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初版
25. 周秉高：《楚辭解析》，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初版
26. 《漢魏十三經古註》，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影印初版
27. [宋]朱子：《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界書局本，1987初版
28.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29.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97年版
30. [清]張廷玉主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31. [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81年影印初版
32. [清]永瑢主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初版
33. [漢]劉向編著，盧元駿註譯：《新序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初版
34. [宋]姚寬：《西溪叢語》，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
35. [明]方孝孺：《遜志齋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36. [明]薛瑄：《薛瑄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
37. [明]周敘：《石溪周先生文集》，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萬曆二十三年(1595)刻本，1997年初版
38.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39. [明]吳寬：《家藏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40. [明]王鏊：《震澤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41. [明]李東陽：《李東陽全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初版
42. [明]周用：《周恭肅公集》，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周國南川上草堂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
43. [明]李夢陽：《空同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44. [明]楊慎：《升菴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45. [明]吳國倫：《甌瓚洞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萬曆刻本影印，1995年初版
46. [明]高攀龍：《高子遺書》，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47. [梁]蕭統選編、[唐]李善等註：《六臣註文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初版
48. [宋]謝枋得：《文章軌範》，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緒九年(1883)置絃歌書院刊本，1991年初版
49. [清]林雲銘：《古文析義合編》，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清末石印本，2001年九版
50. 咎亮：〈《楚辭書目五種》補考五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3期，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A Study on Zhou Yong's *Chuci Zhulüe*

Nicholas L. Chan (CHEN, Wei-shun)*

【 Abstract 】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when Neo-Confucianism was orthodox, Qu Yuan (ca.343-ca.277B.C.) was criticized by the Neo-Confucianists and the high officials in the court, and therefore the study of *Chu Ci* was in a low key, with the only exception of Zhu Xi's(1130-1200) *Chu Ci Jizhu* 楚辭集註 (*Collected Commentary on Chu Ci*). That is because Zhu Xi's approach was seen as the orthodox Confucian perspective and hence the unchallengeable status of his commentary. After the Mid-Ming times, there occurred a great change in the academic climate, a surge of new studies on *Chu Ci* was initiated. Zhou Yong's *Chu Ci Zhulüe* 楚詞註略 (*Concise Commentary on Chu Ci*) was the one among them. Being a high official, Zhou's literary works shows a perspective related to the court style and concern; *Chu Ci Zhulüe*, however, reveals the fading out of the Neo-Confucian influence. Though short and concise, this commentary can be seen as a pioneer work to display opinion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Zhu Xi's. Zhou explicates *Chu Ci* from a perspective that concentrates more on the literary elements of the work itself than on its political and ethical grounds. In addition, Zhou's discussions and speculations on the dating of each chapter of *Chu Ci*, and his treatise on *Jiu Ge* (*Nine Songs*) in effect paves the ways for later commentators on *Chu Ci*. This article will look into the aspects of this book, evaluate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so as to provide a general picture of *Chu Ci* studies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Zhou Yong *Chu Ci Zhulüe*(*Concise Commentary on Chuci*)
Chu Ci studies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 Depart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Fo Gu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